

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

明东 编
李陈主

本书围绕文学史上
文学史重构与文学名著重读
这一热点问题
对以往文学史的编写
进行历史反思总结
论说文学史重构中的观念更新
体例选材
文学史自身的发展规律
文学的本体性等问题
并对具体的经典名著
重新解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菲律宾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资助出版

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

李明滨 陈 东 主编

國立華僑大學圖書館藏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李明滨,陈东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

ISBN 7-301-03207-2

I. 文… I. ①李… ②陈… II. 文学史-研究-世界 N. I109

书 名: 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

著作责任者: 李明滨 陈 东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207-2/I·0407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40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2.80 元

序^①

首先我谈一谈对今天外国文学的估计、评价,对这个问题,大家意见差不多。陈东的论文,写得很好。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文学研究和创作都受到影响,电影、话剧、严肃音乐受到冲击,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少。

外国文学研究是否后继无人?我自己不悲观,不是后继无人,但有问题。我杜撰一个名词:“海洋主义”——下海、出洋。来出席会议的,不属“海洋”范围。

北大研究生生源前几年不够,现在不是不够,而是质量怎么样?我不担任学校(领导)工作了,不了解情况。优秀研究生不想考博士生,不是后继无人,但受冲击是避免不了。

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内部也有问题。去年我写过文章:《翻译的危机》,大家也许看过了。我搞过翻译,但现在不搞了,我拿了几部译著一看,偶然拿原著来核对,大吃一惊,现在人不愿查词典,鲁迅(曾指出过)的“牛奶路”(之类问题)很多。翻译第一必“信”,“信”是道德问题,不“信”,就是不道德。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多,急功近利,提取称等等;另外,没有人监督。50年代有《翻译通报》,有时长篇大论,指责某译作。通报后来被取消。翻译界没人批评不行。现在“信”的问题范围有多大,我没有调查,也不敢说。

第二是汉语的程度,比第一个问题还严重,我们每天的报纸、杂志里若挑不出毛病,就算我输。北大中文系有个老教员从美国回来,挑贾平凹的语句病达170多处。一个中国作家汉文写得通,实在可怕。不是每个作家写得通,可确有;老作家也有,我不说。

① 本文为季先生在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95北京年会上的开幕词。

我讲话有点形而上学，就形而上学吧。

现今人写文章有两类：人话——大家能看懂；鬼话——句子怪，读不懂。上海有个有名的作家的文章，一身邪气。

我写了一辈子文章，旁边放一本词典，我并不觉得丢人，能改则改，不查词典容易出纰漏。

搞外国文学，精通外语应不在话下。年轻人要学好外语。

现象是存在的，不能否定。我跟清华的老师吴宓学 romantic-noes。雪莱有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另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今天开会，三代人在一块，在座的和没在座的，是我们队伍的火种；能扩大更好。我们的队伍信得过，所以，前途光明。

再一个问题：拿来与送去。

拿来，为我所用。

为什么讲“送去”？有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少到可怜的程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除了汉学家，对中国所知甚少。

最荒谬的是诺贝尔奖金，该奖金作为尺度，不可靠。获诺贝尔奖金的，有一流的，也有三四流的。

要送去。民族沙文主义不好，但我们现在不是民族沙文主义，而是民族虚无主义。

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任重道远。十年取得了很大成果，获奖作品，语种扩大，大语种加强，小语种增加，队伍成长了，这就是成绩。

相信在全国外国文学界共同努力下还会取得更大成绩。

我现在还没有到不能刹车的地步，我现在就刹车。

季羨林

1995年4月14日

内容提要

本书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概况，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全书十五章，从文言和白话两大系列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并富有创意地为中国小说史划分了萌芽期、童年期、成熟期、繁荣期、变革期等；全书既有史的勾勒，又有重点作家作品的剖析，资料丰富、翔实，文笔畅达，可读性强，兼有教材与学术论著的双重特点。

责任编辑 曾晓燕

封面设计 金 钟

ISBN 7—5351—0842—

I·33 定价：(简装)7.80元



作者小传

李悔吾，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北新洲人，1928年8月生。湖北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所副所长兼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水浒传》学会秘书长、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三国演义》学会会长等。主编《古代文学作品选讲》、《古代文学作品讲析》、《古代文学作品选析疑》等，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第一副主编，发表专业性论文、文章八十余篇。

目 录

序	季羨林(1)
积极推进文学研究中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乐黛云(1)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出路	陈 东(4)
浅谈《新编欧洲文学史》	孙凤城(10)
回顾与前瞻——试谈《外国文学史》编写	崔宝衡(17)
编写《东方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刘安武(21)
评俄编《苏联文学史》十年三变	李明滨(28)
重构文学史的理论设想	马小朝(36)
略论重构外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础	赖平坚(43)
按文学规律重构外国文学史的设想	张世君(51)
“文学再创造史”的建构	王 诺(57)
文学史方法论再探：编写叙事文学史	傅修延(63)
文学史教材当以艺术作品为纬	马家骏(68)
外国文学史研究中几组矛盾关系的探讨	杨 波(72)
高校俄苏文学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	任光宣(78)
关于“20世纪俄语文学史”的新架构	陈建华(82)
接受文学史体系结构原理及其科学论证	赵复兴(88)
中国文论的教化倾向对外国文学教学之影响	杨丽萍(95)
重读莎剧《哈姆莱特》	王忠祥(98)
论《浮士德》的“人”的主题	易晓明(110)

走向神圣真理——重新阐释《浮士德》·····	陈戎女(117)
重读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贝拉》·····	陈松岩(125)
安徒生新论·····	周云生(134)
《红字》的表征解读·····	赵荣贵(145)
对马丁·路德“重读”《圣经》的一种解析·····	杨慧林(152)
《简·爱》和《法国中尉的女人》比较研究·····	张 敏(159)
托尔斯泰“历史艺术”概念述异·····	胡日佳(171)
《吉檀迦利》思想新解·····	何乃英(178)
从宗教影响看《变形记》与《荒原》的不同立意·····	喻天舒(184)
《尤利西斯》的查禁开禁与世界潮流和列宁的 文化学说·····	许汝社(193)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解读·····	漆以凯(201)
重读德莱赛的两部小说·····	周明燕(210)
对海明威的女性解读·····	于冬云(216)
川端康成的乡愁之树——《古都》的文化选择·····	陈春香(223)
《静静的顿河》：成人童话的消解·····	刘亚丁(231)
肖洛霍夫的史诗艺术·····	何茂正(237)
重读《被开垦的处女地》重论有关问题·····	徐家荣(246)
重读《解冻》·····	李毓榛(253)
表意与黑人文学·····	王莉娅(261)
试论经典重读的必要性·····	方位津(266)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95北京年会纪实·····	张 冰(271)
首届全国高校外国文学科研成果获奖名单·····	(273)
编后记·····	(275)

积极推进文学研究中的 新思想和新观念

乐黛云

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变迁和更新,首先是观念的更新,只有更新观念,文学才有新的突破。中国魏晋二朝吸收了大量西域文明和印度文明成果,对过去的文学观念有了很大革新,这才导致盛唐的出现;“五四”时期也是如此,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中国文化是很大的冲击,引起了文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使中国文学从旧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

到了目前世纪转折时期,西方文化观念也在更新,这种更新遍及各个学科。最主要的更新至少有两方面:一,客体与主体二元对立的关系逐渐瓦解,中心与边缘对立的模式正在改变。二,原来的西方文化观念着重细致入微的分类剖析,目前不少人感到要认识一个事物,很难单纯从事物本身来考察,而需要了解其发展脉络,需要在与“他者”的对比中找到其定位,在网络中进行分析。

这些观念的变化,也引起了文学思想的变化。例如关于作品的意义,过去多半从作者的“原意”去探求,后来人们感到作者的“原意”未必能完全表现在作品之中,而作品所表达出来的,也可能完全是作者未曾想表达的,它也许反映了作者的潜意识,也许只是某种社会思想不自觉的投影。而且,由于读者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不同,也会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离开社会的变化,离开一定的语境,就很难对作品的意义作全面的理解。离开历史的发展寻求文学史的封闭的规律也不大可能。

目前,心态史和形象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代、社会的不同人的心态值得研究。例如,对人性的看法也是一种心态。杨正润的《人性的足迹》,就是一种心态史研究,在中国开风气之先。心态是共通的,人类大脑的构造是一样的,这就会有某些共通的心态。

形象史专门研究文学形象,有多个方面的意义:一,有助于从一种文化研究另一种文化。如德国文学中对中国人的描写,从很多变化中可以找到一条线索,反映德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误读;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变化。1993年我们曾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合办过一个关于《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国际学术讨论会。独角兽和龙,都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象征。马可·波罗到中国寻找独角兽,认为中国也应有同样的象征,但他没有找到,就把犀牛描写为中国“丑陋的独角兽”。参加1993年会议的意大利著名理论家、作家埃科教授特别指出,他这次来中国,不是要寻找“独角兽”,而是要了解“龙”的文化蕴含。“独角兽”与“龙”的形象,正是两种不同文化的象征。二,另一个极端是把另一种文化看作乌托邦,非常了不起,因为觉得自己的文化有问题,对现实不满,因此想找另外一种寄托。对乌托邦的追求也不一样,中国的桃花源是曲径通幽,老人和孩子都在充分享受闲散和自由。而西方的太阳岛非常开阔,阳光明媚,没有多少老人,只有小孩在学习,在接受严格的训练。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对不同形象的理解。文学形象,比如对少女的描写,不同文化中都有不同和相同的强调方面。各个时代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描写也不相同。阿Q认为洋鬼子的腿是不会弯的,走到哪里都拿着“哭丧棒”(文明棍),也反映了当时下层人民对外国人的一种看法。可以说,目前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研究界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心态史和形象史。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已经在这个基础上出版了九卷本欧洲比较文学史。目前正在编写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卷。我们已接受编写东亚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化史的任务。大约第一卷将讨论中国文化如何传播影响到日、韩;第二卷讨论西方文化如何经过日、韩传到中国;第三卷讨论东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双向传播与

影响。

总之,文化的接触会越来越多。经济上也会有更多互相合作、依赖。由于政治、经济问题而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引起战争呢?有人认为非西方化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将是最大的危险(亨廷顿)。当然是不对的,但不同文化之间确实需要互相理解、互相沟通,过去的西方中心论或大国中心论已经没有市场;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相对主义——承认不同文化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例如,西藏的天葬,鹰吃干净了已死父母的尸体是对死者的孝,而非洲有个部落,人到60岁,就被儿孙杀死,以减少痛苦,得到灵魂的解脱。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不能用某种文化为标准,来指责这些民俗为野蛮,它们只能在该民族自身的文化演化中得到改变和发展。但文化相对主义也有自身的欠缺,它容易导致封闭、僵化,固守已有的一切,很难参照别人的长处而得到更新;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也很容易导致忽略人类还有共同一致的东西。如果不承认这种东西,人类就很难和平处于同一个地球。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天同此理”、“人同此心”,“将心比心”是值得研究的人类共存方式。1995年10月份将在北大召开“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会议,就是想在文化差异和共存等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推进。

未来21世纪文化的前景是多元共存,互为补充,依靠不同文化的多视角、多层面的思考来解决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由于文学的隐喻性、虚构性,文学在各种文化中肯定是最敏感最前锋的。反映人类心灵的文学是沟通各种文化的很重要的方面和最前沿的阵地。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以中国文化为诠释框架的中国人写的外国文学史,当然,也会出现以外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史。正如已故杨周翰教授早就提倡的,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一定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我们需要中国人自己写的外国文学史。

中国文化在解决未来世界的问题中必将起更重要的作用。在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诠释中得到更新的,有着伟大创造力的中国文学也必将在未来的世界文学格局中有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出路

中国新闻学院 陈 东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起点,随着“文革”的结束、国家政策的变通、工作重点的转移,人们的思想也活跃起来,迫切需要不同文化、不同文学的滋润。一时间,外国的作品、评论等成为“紧俏商品”,这就大大促进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到1985、1986年,外国文学研究达到建国以来的高峰。但好景不长,从1986、1987年开始,外国文学研究似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失去了“宠爱”,人们的目光渐渐转向了商品市场,他们扔下手中的书籍、文章,投入到更为广阔的“商海”中去了。由此,外国文学研究一年不景气于一年,这几年,它进入到了谷底,而且并没有走出来的意思。

外国文学研究的繁荣发端于改革开放政策,其“衰落”的原因却在于这一政策的深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授、学者似乎非常陌生;面对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不少人感到迷茫难从。毕竟,外国文学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深奥,它与灵活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市场无法合拍。于是,有人“下海摸鱼”去了;有人改行从政去了;甚至有人放下了清高,做起了文学掮客;还有不少人放眼于海外,想在国外寻求栖身之地……不仅个人如此,在不可抗拒的市场化趋势中,被“养起来的纯研究性质刊物”的命运也引起了争议,各地纯研究刊物纷纷转向,增加纪实性、生活性作品,减少纯学术性文章。出版单位也同样,一改过去的做法,再也不愿赔本出书。这正是

文人学者个人转向的主要原因。但责任在谁？纯研究刊物和出版单位转向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因素，“精神食粮”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后，这些刊物及学术书籍大多销路不好，亏多盈少，难以生存，转向总比停刊好吧！

确实，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成了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外国文学研究至今还在谷底徘徊的主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外国文学研究难道就没有自身的不足吗？纵观建国、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不难发现，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缺少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督系统，缺少对已有成果的反思和及时清理，这容易导致研究的盲目、重复和无规则。现在该是重新审视和清理的时候了，否则，外国文学研究很难跳出自己的局限，出现炒冷饭、陈词滥调的现象。只有认真总结过去，对现有学术资料进行清理，才能避免闭门造车，我行我素，才能避免出现一些貌似新奇实则早已有之的东西。

如果仔细探讨一下，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并不成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极端政治化，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创作方法、倾向性等范畴来解释一切文学和一切文学类型，造成研究与原作品的严重脱离。或者，在评论方法和分析方法上达不到辩证综合的高度，使用一种“八股”模式——先思想后艺术，把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意义分成两个部分，看似全面，实则脱节。因为文学作品的认知意义、道德意义是与其美感意义结为一体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在理论上是可以分析的，而实际上却是有机的统一”，语言的形式、结构的美感是认知意义和道德意义的载体，如果不从语言的形式、作品的结构入手，怎么能够准确地把握作品的认知意义和道德意义呢？辩证综合的分析应该先从语言符号入手，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整体价值（自然，作为外国文学作品，由于译本等诸多因素，从其语言形式、结构入手加以研究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与上述两种现象相并存，另一个现象尤其值得注意：不少外国文

学研究者喜欢引进、贴标签和对号入座。他们满足于引进一套又一套的批评理论,从精神分析到接受美学,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一会儿是“符号学”,一会儿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甚至出现了“后后现代主义”等等。从古典到最新、最激进的外国文学理论(西方),全都被拿来了,但放眼望去,我们却只能拜读到一些“导论”、“引论”、“概论”之类的浮浅的介绍性文字,用之于外国文学作品分析的更是“概而又概”,并没有人肯去实实在在地吃透哪怕是一家的理论。这样,在评论某部作品或作译文序时便只从各种理论中抄袭若干术语,东拼西凑,当标签贴,而不做实际的分析研究工作。等更新的理论来了,便又放弃旧有的,拿过新的来介绍一通,甚至用这种新的理论去贴曾被自己已经用其它理论贴好了的作品!拿来而不用,或只是用来装装门面,这种不负责任、不科学的做法给外国文学研究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商品大潮的裹挟之下,外国文学研究界又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其一,研究人员两极分化。一方面,不少人片面地理解“商品化”,完全投入“商海”,将有别于一般物质生产的艺术文化行为视同商业行为,不再以精神文化目标为文,而是追求利润,“为钱而作文”,以致翻译一些迎合流俗的外国文学作品,作一些“有刺激性”的评论文章。毫无疑问,这些粗制滥造的作品严重地损害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品位和质量。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者缺乏文化艺术的商品意识、产业意识和市场意识,武断地认为文化艺术与市场经济接轨是向钱看,是文化艺术的堕落。于是,他们固守着长期形成的陈规陋习,深居于象牙塔中,玩味那种寒酸的失望意境。这部分人完全不顾社会精神消费需求,坚持生产与消费相脱离的错误观点,其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加孤寂,到头来慨叹什么“社会堕落了,人们的素质降低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随之丰富起来。以现在看来,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呈个性化与多样化趋势,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需求,总体上偏向“大众性”、“消遣性”和“通

俗性”。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看清了这一趋势,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同时,也有不少人都需要较高层次的“精品”,由于这批人看不上象牙塔中生产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离现实太远),因而他们时常处于饥渴状态。这是外国文学研究产业结构不合理的表现。这样,如何正确处理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又提上了日程。

问题已经摆到了我们面前,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我们自然有义务有责任去解决它们,只有这样,外国文学研究才有可能从谷底走出来。

首先,我们应该把握住自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认识外国文学研究这门科学。翻译文学自不必说。外国文学评论是个大问题,必须看到,它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范畴以至自己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外国文学评论与国语文学评论一样,它应该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而不应该一提起它就必须谈到意识形态,更不应该贴标签或对号入座。当然,外国文学批评脱离不了具体作品,但它自身却也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批评者并不只有认同原作品价值的义务,他还有创造评论文章自身价值的权利。实际上,评论文章与原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活动——共时态活动,它们相互激活、相互阐释,形成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读者听到的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两个思考主题的双重变奏。这双重变奏引导读者去思考,去挖掘更深意义上的内涵。因此,外国文学批评者不仅要熟悉对象国文化,而且要具有与对象国作家同等的审美感受力和想象力,同时也要求具有严格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头脑和价值批评能力。所以,批评者不仅是原作品的注释者,还是使原作品具有更深意义的创造者,他集注释者与创造者于一身,与原作者是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高于原作者。实际也如此,我们确实不是原作品或某一理论、某一模式的附庸,我们是清醒的创造者——在“批评”中,我们创造了“外国文学研究”这一自足的体系。

目前的商品浪潮是捉摸不透的,新加入商品行列的外国文学研

究也是如此。不少品位低、质量差的作品在文化市场上获得了很大成功,而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常常无人问津,这致使不少人竭力呼唤外国文学研究完全商品化。他们根据一时的现象断言,我们正在进入所谓“消费文艺的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与一般物质生产完全一样,应该完全以文化市场的消费来规定研究的方向。显然,这种论调是上述提及的“为钱而作文”的那部分人提出来的,是非常片面的。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并不总是成正比例,这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上的成功与否来判断作品价值的高低,在市场上,一本书的成功可以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其内在价值不一定就非常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这是消费对于生产的能动影响所致。但在肯定消费的能动性的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他认为,“生产靠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所以,“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也就是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因此,在文化市场范围内,在密切关注市场消费所反映的群众文化需要、努力去满足那些健康向上的精神需求的同时,外国文学研究者要明确生产的支配作用,不能只是听任市场上价值规律的摆布,以致忽视艺术规律和思想工作规律的作用;否则,其结果很可能是“劣胜优汰”,外国文学研究会完全受金钱的支配,背离为人民服务、提高国人欣赏外来文化能力的正确方向。这就要求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以赢利为最终目的,而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提倡有益的,容许无害的,抑制低级的,取缔反动、淫秽的,始终以促进人类精神文明为最高原则和最高目的。

文化艺术从旧的运行机制与模式中走出来与“经济”接轨,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文化艺术一部分的外国文学研究同样也要与“经济”接轨,受商品浪潮的影响,外国